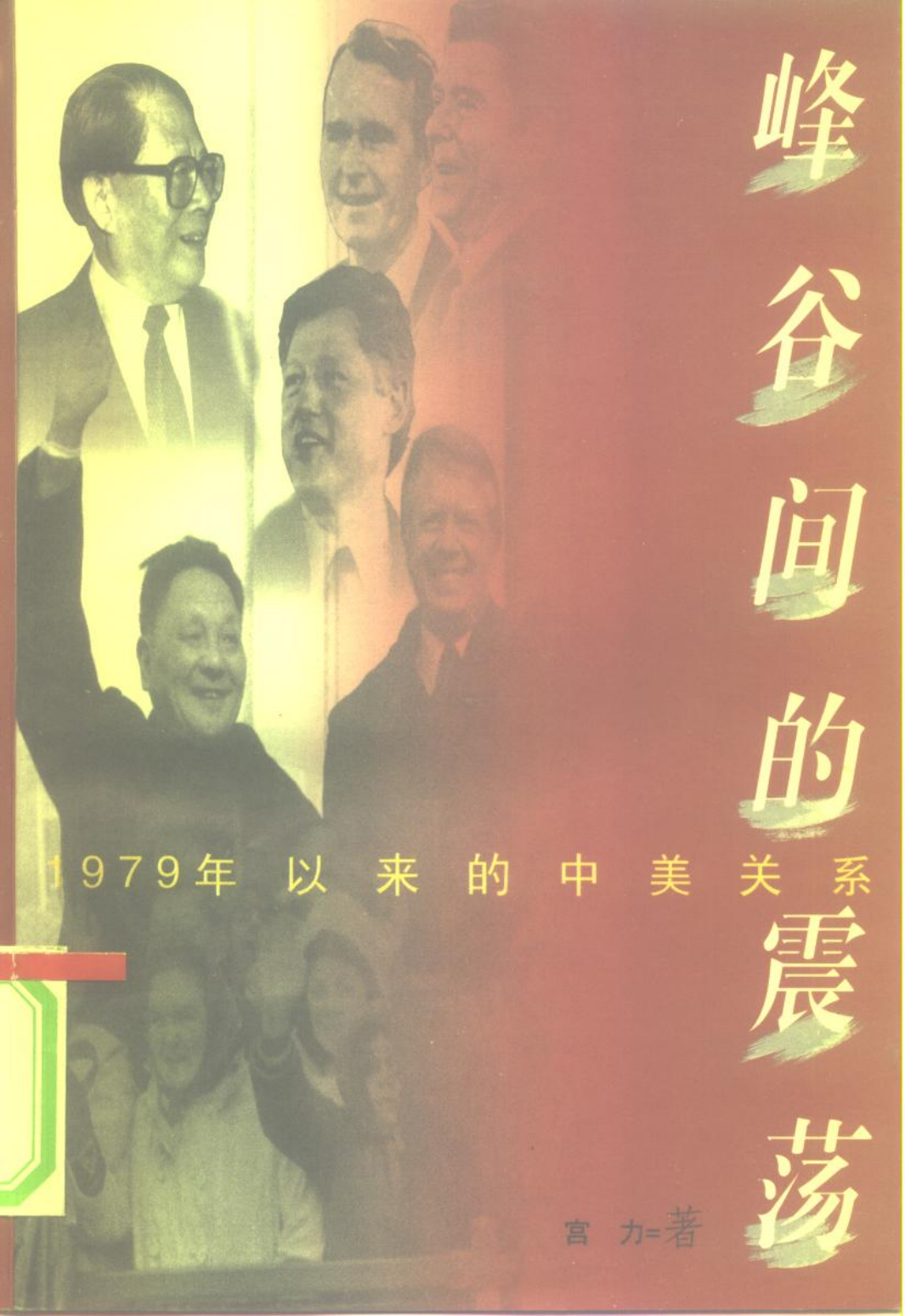




峰谷间的 震荡

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

宫力著



国防大学 2 065 9858 2

峰谷间的震荡

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
宫力=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峰谷间的震荡:197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宫力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1

ISBN 7-5006-2376-3

I. 峰...

II. 宫...

III. 中美关系-研究

IV. D822. 37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291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河北遵化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1.25 印张 4 插页 250 千字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5.50 元

导 言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彼此一向怀有友好的情感，两国间的交往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1784 年美国就通过“中国皇后”号商船远航广州同中国建立了联系。从那以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曾经是很频繁的。虽然由于主要不是中国方面的原因，中美两国在本世纪的 50 年代和 60 年代曾经一度“隔着一道敌视和猜疑的鸿沟彼此冷眼相看”，^①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感并未就此泯灭。还在中美关系处在隔绝的年代，毛泽东主席就曾充满希望地预言：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必然会把中美两国人民再拉到一起。周恩来总理生前也曾表示，希望中美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②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交使毛泽东的预言和周恩来生前的希望化作了现实，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心愿和根本利益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它为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乃至军事上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美关系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不过，中美正式建交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的关系从此就踏上了坦途，不会再出现困难和波折。客观地说，中美这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迥然不同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在 70 年代捐弃前嫌，逐步接近，形成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关系，并不在于两国有什么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而是由于两国在一系列涉

0050125
21

及到各自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对付苏联威胁的问题上具有共同点。问题在于，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毕竟不是一个长久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在本书所重点涉及的80年代和90年代，是国际局势逐步趋向缓和以及来自苏联的威胁逐步减少的时期。中美关系开始经历一系列的考验。因此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具有新的内涵。

自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除了苏联因素之外，经济因素、台湾问题、人权问题、武器扩散问题以及世界格局和中美两国国内政局的变化，都对中美关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呈现出跌宕起伏、复杂微妙的特点。具体来说，1979—1995年的中美关系大致可以划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1月中美建交到1981年1月卡特政府下台，这是中美关系处于高峰的时期。此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把苏联作为主要的敌手，因而两国在各自的对外政策中都增加了互相协调的因素。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美国之行加固了中美关系之间的这种协调关系，随后，在中国“教训越南”的过程中，中美关系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美经贸关系开始加深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美贸易协定的正式签定，使中美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的问题获得解决，从而加强了中美经贸发展的势头。此外，中美在文化、科技甚至军事关系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争端。这主要是由于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便通过了一个违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原则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且在暂停一年之后重又恢复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从而给中美关系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第二个阶段，从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到1983年，中美之

间因台湾等问题发生一连串的纠纷，中美关系出现波折。里根在执政初期，既想同中国维持一种战略性的关系以共同对付苏联，又不想割舍与台湾的“交情”，并且以为，中国在战略上有求于美国，因此能够吞下某些苦果。但这只能说是一厢情愿。中国方面对里根政府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言论以及提高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质量和扩大其规模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而且抓住中苏关系有所缓和的机遇，适时调整了政策，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在此期间，中美双方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美关系曾一度存在着倒退的危险，后经双方进行多次谈判，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使这场危机有所缓解。但由于美方在此之后，仍不时作出违反中美联合公报的事情，中美之间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斗争仍时有发生。此外，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中美关于中国纺织品输美的争执、美国给予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政治庇护，以及荒唐的“湖广铁路债券案”等不愉快的事件，由此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气氛。但这时美国在战略上仍需借助中国，在经济上则看好中国的市场，因此，也不愿意把中美关系搞僵。从1983年下半年起，美方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中的偏差。1983年6月，美国正式宣布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P组国家改为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类的V组。在此之后中美双方共同为修补篱笆进行了艰苦的工作。

第三个阶段，从1984年中国总理赵紫阳访美到1989年美国布什访华，是中美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经过1983年下半年以来一系列的努力，中美关系开始回升。1984年1月至4月，中国总理赵紫阳和美国总统里根实现了中美建交以来

的第一次国家领导人正式互访，标志着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日益引起美国的兴趣。中美之间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大大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展开。到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大关，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外国贸易伙伴；美国在华投资已累计达630个，协议金额34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的14%。中美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文化教育、新闻以及军事交流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两国高层的政界、军界领导人的互访也日益扩大。但在中美关系相对平稳发展的同时，双边关系中也出现了一股暗流，那就是随着美苏、中苏关系的缓和，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人权因素开始上升，美国时常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说三道四，横加指责。1987年美国国会还通过所谓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并邀请达赖访美，又给中美关系投下了不祥的阴影。此外，美国一方面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另一方面又在所谓中国向伊朗出售“蚕”式导弹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也引起了双方的一些争执。

第四个阶段，从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风波至1993年11月中美首脑西雅图会谈前。这是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的阶段。1989年6月，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双方在人权、对华最惠国待遇、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磨擦和争斗。进入90年代，原苏联以及东欧发生剧变，使美国受到鼓舞，由此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企图以压促变。但中国方面坚持内政不容干涉的原则，坚决顶住西方的压力，并逐步稳定了国内的政局。在此期间，中美双方为了不使双边关系完全破裂，也都作出了某种妥协。美国总统布什先后派特使斯科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贝克访华，并排除国会的干扰继续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中国方面则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允

许在美国驻华使馆中“避难”的方励之出国就医，并陆续采取了一些缓和双方关系的措施。但总的来说，中美关系仍在低谷中徘徊。

第五个阶段，从1993年11月中美首脑西雅图会谈到1995年中美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协议。这时的中美关系开始从低谷中艰难地回升。由于中国国内政局日益稳定，并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牢牢站住了脚跟，使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美国不得不继续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打交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又一轮快速增长时期的到来，经济利益的因素开始在中美关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美国利用亚太地区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之机，实现了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重要会面。中美关系由此出现改善的趋向。1994年5月，克林顿宣布人权问题与中国最惠国待遇脱钩，扫除了中美关系中的一大障碍。在此之后，中美高层互访增多，经贸关系也有大的发展。1994年11月，江泽民出席在印尼茂物召开的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雅加达与克林顿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晤。中美关系继续在矛盾和磨擦中回升。1995年和1996年，中美经过艰巨的谈判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协议，避免了一场贸易战，同时也给陷入僵局的中国复关问题带来了转机。然而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烽烟又起。1994年9月7日，美国宣布调整对台政策，提升美台关系规格，这是一个严重的步骤，引起了中国方面的警惕。1995年5月22日，美国政府又宣布允许李登辉前往美国进行所谓“私人访问”，严重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则开始变换手法，力图在国际场合，多边场合来向中国施压。而且美国至今仍未宣布解除1989年以来的对华制裁。这些因素都延缓了中美关系的全面改

善。

1979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段坎坷不平的路。在此期间，中美关系时而阳光灿烂，时而风雨交加，但总的来说，两国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达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程度。这充分说明中美关系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的。尽管时至今日中美关系中仍存在许多困难和矛盾，但这些矛盾和分歧不可能抹杀两国之间的共同点和相互需求，现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和中美两国的国家根本利益，都要求中美这两个大国不再对抗而应合作，这也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在对外关系方面，国家利益应当超越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之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只有符合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才能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够持久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目前，可以说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在历史的机遇和挑战面前，需要两国的政治家高瞻远瞩，站在时代的潮头，作出明智的抉择。

注 释：

① 尼克松总统致送国会的报告《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缔造持久和平》，1973年5月3日。

② 转引自邓小平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国家美术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亚洲协会等团体招待会上的讲话，1979年1月30日。

目 录

第一章 新的起点	(1)
一 中美建交的艰难历程和邓小平副总理访美	(1)
二 中越边境冲突过程中的中美苏三角关系	(24)
三 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及其影响	(30)
四 蒙代尔副总统访华	(37)
五 军方关系的建立	(43)
第二章 台湾问题的纠葛	(52)
一 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52)
二 中国反对美国恢复售台武器的原则立场	(59)
三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人员享受外交豁免权 问题引起的风波	(63)
四 里根上台前后对华政策的演变	(65)
第三章 中美“八一七”公报的产生	(78)
一 邓小平阐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78)
二 里根政府的回应	(81)
三 对台销售武器问题再起波澜	(86)
四 谈判期间的唇枪舌剑	(89)
五 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含义	(98)
第四章 拉开距离	(103)
一 中国强调“独立自主”和“不结盟”	(103)

二	美国的“新现实主义”	(108)
三	经贸纠纷	(110)
四	“湖广铁路债券案”	(113)
五	胡娜“政治庇护”事件	(116)
六	一枚不定时的炸弹——台湾问题	(119)
第五章	稳定大局的举措	(129)
一	修补篱笆的努力	(129)
二	中国总理赵紫阳访美	(137)
三	美国总统里根访华	(145)
第六章	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	(157)
一	高层磋商	(157)
二	台湾问题的微妙变化	(162)
三	人权问题起纠纷	(165)
四	扫除“不好的气氛”	(176)
五	发展有限度的军方关系	(181)
六	双边贸易持续增长	(183)
七	科学技术合作不断扩大	(187)
八	文化教育新闻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189)
九	中国强调在对外工作中加强国际经济、科技合作	(190)
十	美国新任总统布什访华	(192)
第七章	跌入低谷	(199)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9)
二	“西藏问题”再起烽烟	(201)
三	“六四”的震荡	(204)
四	中国提出改善关系的四点意见	(207)
五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斡旋	(211)

六	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议案·····	(214)
七	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访华·····	(219)
八	美国发表《人权报告》·····	(226)
九	对华最惠国待遇之争·····	(229)
第八章	艰难的回升·····	(234)
一	海湾危机提供的机遇·····	(234)
二	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第二次较量·····	(238)
三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及其含义·····	(242)
四	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	(246)
五	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第三次较量·····	(253)
六	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 F—16 战斗机 ·····	(255)
七	克林顿政府上台初期的对华政策·····	(257)
八	西雅图中美首脑会晤及其影响·····	(263)
九	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	(271)
十	双边关系的新进展与新问题·····	(219)
结 论	·····	(285)
中美建交以来大事记	·····	(293)
主要参考文献	·····	(339)
后 记	·····	(346)

第一章 新的起点

1978年12月中旬，中美双方经过旷日持久的艰巨谈判，终于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达成协议。虽然在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等遗留问题上，双方仍保留了各自的观点，但美国政府毕竟在总体上承认了中国所坚持的建交三项基本条件（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美蒋条约），这就为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打下了基础。在这之后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基于在国际战略格局方面的共同利益，迅速、全面地发展了在各个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使中美关系又大大向前跨出了一步。

一 中美建交的艰难历程和邓小平副总理访美

自从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最终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务已经提到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当时因台湾问题，中美尚未建交，但两国领导人都表现出要克服这一难题的诚意。1973年2月，尼克松曾派基辛格访华，向中国方面表示，美国打算削减在台湾的军事力量，并准备在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后两年用“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台湾保持民间关系。1973年5月，中美双方还在各自的首都设立了联络处。然而，正当

尼克松踌躇满志地准备实现他的宏伟目标之时，一场由“水门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袭来，使他再也无法兑现其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

1974年4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利用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的机会，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基辛格搪塞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对此，棉里藏针的邓小平不失分寸地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此时，处于岌岌可危地位的尼克松已失去了往日的魄力，不敢在台湾问题上迈出大的步子，因为他不希望得罪国会中那些与台湾关系密切的保守派议员，这些议员曾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不仅如此，尼克松为了避免招致那些亲台势力的攻击，还开始加强美国同台湾的关系。这包括美国快得有些异乎寻常地任命了一位高级外交官昂格尔赴任驻台北的新“大使”，而不是让那个大使馆由一名代办负责；允许台湾在美国开设两个新领事馆；以及向台湾再次出售潜艇和军事装备。显然，这些举动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也没有使他的处境改善多少。到了1974年8月，尼克松不得不辞去总统之职。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当初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的时候，实力强大的右翼势力是反对这样做的。然而正是由于尼克松本人一贯以“反共”著称，他才敢于挺身而出，冒着极大的风险，推行同中国和解的政策。假定没有水门事件掀起的狂澜，以尼克松的胆识和远见，他是能够兑现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的辞职对于中美早日合理解决台湾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水门事件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继任总统福

特在其就职的时候说：“这是一个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创痛的历史时刻”。虽然福特总统上任后一再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变，美国将“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共和党在水门事件中大伤了元气，福特所领导的政府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软弱无力的地位，根本不敢在台湾问题上有所作为。

1974年10月21日，美国新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飞抵北京，在谈到妨碍美国和中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台湾问题时，他说：“就此事的紧迫性来说，就此事是否需要大大加速进行来说，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考虑和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考虑而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不十分忙。”但他又说，我们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继续改进，这就是我的目标”。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同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度访华，但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他在乔冠华外长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只是用最一般的词句谈到中美关系，但他强调了与中国领导人举行定期会晤的重要性。

由于周恩来此时已发现癌症住院治疗，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与基辛格举行会谈。在会谈开始时，基辛格试图缓和一下气氛，他指着摆在他面前的三本厚厚的提要手册对邓小平说：“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手册从头到尾向你念一遍。”邓小平机敏地问：“这几本手册有几吨重？”基辛格说：“有好几吨重。而且我另外还有一些。这仅仅是我们的开场白。”邓小平装出一副严峻的样子对基辛格说：“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①

可是，随着会谈的深入，双方的态度都变得严峻起来。基

辛格提出了一大堆困难，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基辛格表示：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政府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很明显，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比起尼克松在任时的承诺已有很大的改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北设联络处），中国不能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②邓小平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坚定性，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加大，基辛格的这次访问只能是空手而回。基辛格本人也表示，他这次访问的任务也只是为了“再次肯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事后双方发表了完全是礼节性的仅有四句话的公报，除了宣布福特总统将于1975年访华之外，什么具体的协议也没能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由此陷入了僵局。

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后，开始寻找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这年6月30日，他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一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而又仍然保证台湾人“维持和平生活”。^③为此，他决定派遣国务卿万斯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

性”的访问。

1977年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同中国外长黄华举行正式会谈。万斯说：只要我们能够寻求一个基础，不致危害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并能使（美国同台湾）非正式的接触得以继续，那么，总统就准备使（美中）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因此，我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万斯代表美国政府声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即将“终止”（这里，万斯有意不用“废除”一词），美国将从台湾全部撤退其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是万斯提出，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解释说，这种人员不具有外交人员性质，也没有国旗和政府印鉴等大使馆的特征或权利。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发表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①。万斯的这个方案与中方的要求仍有较大的距离，没有为中方所接受。黄华坚持中国关于中美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并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

8月24日，中方决策人邓小平会见了万斯一行。邓小平认为万斯所阐明的美国立场，是从上海公报后退。他对万斯念了一段过去中美会谈的备忘录，指出基辛格曾承认美国欠了中国的债，并说正常化将依中国的条件实现。邓小平还提到福特总统1975年访华时曾经说，在1976年选举之后，他将处在较好的地位，可以按照日本方式来实现正常化。邓小平认为，万斯提出的所谓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湾，是一个没有标志或大门上没有国旗的大使馆。这是中国方面所不能接受的。接着，邓小平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那就是，如果要解决，干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中国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